

衛禮賢《永恆與變化》 之《易》學思想與威瑪文化精神

蔡郁焄*

（收稿日期：102 年 9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3 年 3 月 6 日）

提要

本文認為中、西《易》學建立於不同的學術傳統和文化背景下，是故在研究西方《易》學時，絕不能將其與中國《易》學等同，或以中國為標準評價其優劣，而是應置於西方學術傳統和時代背景下，才能對西方《易》學的特色有正確的解讀。本文以衛禮賢的《永恆與變化》一書為主要材料，考察時代對衛氏《易》學的影響，藉以說明西方《易》學與時代背景的密切相關性。

整理衛氏《易》學思想主要有三：第一，以《易經》為積極的卜筮之書。第二，建立在分析心理學上的《易》學研究。第三，對立與協同的有機《易》學思想。其《易》學思想特色，具有現實意義，主要是針對時代問題而發。衛氏身處於戰敗後的威瑪共和國，此時代體現的文化精神，有著深刻的內部分裂，以及對完滿性的渴求。對於時代的焦慮和恐懼，一方面孕育了豐富的創造力，但也造成精神衰弱，對於未知領域的寄託。衛氏的《易》學思想孕育於這樣的時代，故以《易》為卜筮之書，能為人指引未來，以分析心理學詮釋《易經》的特殊方法論，以及從對立到協同的思考，和建立有機體思想以滿足對完滿性的渴望。

關鍵詞：衛禮賢、《永恆與變化》、西方易學、威瑪文化精神

* 致理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中、西方論《易》，無論是關注的問題和研究方法皆有所異。從十七世紀《易經》作為西方用以理解中國的經典以來，西方對於《易》的詮釋，呈現與中國傳統《易》學截然不同的風貌。根據趙娟對西方《易》學發展的初步觀察，在研究路徑方面，大致可分為傳教士漢學為母體的宗教學、榮格為起點的分析心理學——比較文化學和考證、思辨為特徵的歷史——哲學等路徑。¹此三種研究方法和視角，皆為中國傳統《易》學所無。中國傳統的治學之道，著重「辨門庭」、「論流派」，就《易》學的發展而言，主要分為「象數」和「義理」兩大流派。²流派之別，不僅表現為解《易》方法的差異，還有對《易》分「經」、「傳」與聖人之道關係的看法不同。西方理解《易經》，不同於中國傳統將之視為聖人之作，有權威、不可顛覆的地位，故不糾結於流派之別和傳承聖人之道等問題，在解《易》方式和版本採用上有極大的自由。因此，有以天主教概念附會《易經》、拋棄中國注疏傳統及翻譯時沒有察覺版本選用的意義等現象。³對此，或有人批評西方對《易》哲學及其象學體系缺乏根本的了解，因此只能作一些膚淺的論述，並得出很多荒謬或不切實際的結論。⁴

實際上，「《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易經》作為開放性文本的意義，在於不同的研究者，跨越時代，甚而超越文化的，都能藉由《易》的智慧去呼應、觀照自身的問題。那麼，如何看待西方的《易》學研究？如何解讀西方和中國傳統《易》學發展迥異的現象？換言之，同以《易經》為文本，在關注問題和研究方法上何以有如此大的差異？欲理解這些問題，必須回歸西方的學術傳統和時代脈絡。

綜觀四百餘年來的西方《易》學研究，無論是問題意識或研究方法，始終與西方的學術傳統和時代背景息息相關。來自古老中國的《易經》，成為西方學者借以參與西方學術思考和討論的一種途徑，甚或反思西方文化。因此，看待西方《易》學時，絕不能將其和中國《易》學等同，或以中國為標準評價西方《易》學之優劣，因為西方《易》學的知識內容雖是中國的，卻孕育於西方的學術傳統和時代背景之中，他們對於《易》的詮釋、關注問題和版本採用等，基本上都是從西方的學術傳統或回應時代問題而來。因此，研究西

¹ 趙娟：〈問題與視角：西方易學的三種研究路徑〉，《周易研究》第4期（2011年），頁71-77。

² 張善文：《象數與義理》（臺北：洪葉文化，1997年），頁32-39。

³ 相關說法參見趙娟：〈問題與視角：西方易學的三種研究路徑〉，頁71-77。以及David R. Knechtges, "The Perils and Pleasures of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收於鄭吉雄、張寶三合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頁1-51。

⁴ 劉瀚平：〈易學在西方〉，《國文學誌》第2期（1998年6月），頁98。

方《易》學，結合其學術傳統和時代背景作討論，是非常重要的。如同張西平教授對研究西方漢學方法的省思一樣，「對於西方漢學的解讀僅僅因為你是一位中國本土的學問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同時也是一位西方文化的研究者，只有這樣解讀才能更全面些。」⁵

本文將以衛禮賢的《易》學為出發，考察時代對衛氏《易》學的影響，及其《易》學思想反映的時代問題及精神，藉以說明西方《易》學與時代背景的密切相關性。論衛氏《易》學以時代為線索，而不論西方的學術傳統，是因為漢學是在正式成為學科，也就是在大學中設立漢學講座或專門學者，才建立起漢學學術傳統。筆者認為德國的《易》學研究，甚或西方的《易》學研究，在衛禮賢《易經》譯本出現之前，⁶時代對於西方《易》學發展的影響力，更甚於學術傳統。換言之，在專業漢學家及權威譯本出現之前，西方對《易》的研究多是針對時代問題而發，不糾纏於《易》文本的歷史事實和理解正確與否的問題，缺乏考證、思辨的精神，故對《易》的研究方法呈現紛雜的面貌；專業漢學家和典範譯本出現後，學者多依賴該譯本的翻譯理解《易經》，出現了文本派和實用派二大體系，⁷為後來西方論《易》的學術傳統。而衛禮賢正是轉折期的關鍵人物。在衛禮賢之前的西方《易》學研究，沒有受到中國古代象數、義理之學的影響，根據自身所理解的中國文化與宗教為理解準則，忽略《易經》所源出的傳統和文化價值，多是針對自身時代問題而發的《易》學著作；而衛禮賢《易》學出現之後，由於其《易經》翻譯是與中國易學家合作的成果，立於中國象數、義理派的傳統之上，成為西方學者理解《易經》的標準本，⁸所開創的實用派學術傳統，至今對西方《易》學仍有深厚的影響。⁹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主要處於德國威瑪共和時期（1918- 1933），其《易》學相關著作也完成於此時期。當時德國飽受戰後的摧殘，軍事的失敗，使得國內政局動盪不安，不僅在政治體制上出現了反省、改革的聲浪，在藝術、文化和思想上也產生了巨變。當時一批有智識的精英份子，包括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湯瑪斯·曼（Thomas Mann）、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在面對時代的衝擊時，分別從科學、藝術、哲學、文化等方面為時代困境尋找出口，開啟了德國史上一段短暫而燦爛的文化傳奇，甚至有人稱之為「黃金 20 年」。

⁵ 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年），頁 385。

⁶ 衛禮賢的德譯本《易經》1924 年在德國出版，之後由貝恩斯（Cary F. Baynes）譯成英文，1950 年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至此對西方《易》學的影響力從德國擴展到整個英語世界。

⁷ 韓子奇：〈近代出土文物對歐美《易》學的影響〉，收於鄭吉雄編著《周易經傳文獻新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年），頁 80-87。

⁸ 廖名春等著：《周易研究史》（湖南：湖南出版社，1991 年），頁 462。

⁹ 對於衛禮賢的實用派對歐美《易》學的影響，詳見韓子奇：〈近代出土文物對歐美《易》學的影響〉一文，收於鄭吉雄編著《周易經傳文獻新詮》。

代」。¹⁰威瑪文化展現了豐富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主要來自對時代問題的焦慮和恐懼，以及一種命定覆滅的危機感。衛禮賢《易》學即孕育於這樣的時代背景。衛禮賢相較於威瑪時代的精英份子以藝術、文化等回應時代問題，他將眼光轉向了東方，選用《易經》作為時代問題的省思。衛氏以《易經》的東方智慧反省西方文明的弊病和解救文明沒落的良藥，既與威瑪文化知識份子的省思相呼應，又展現了以漢學方法為思考的特殊性。實際上，德國漢學在此時期有大幅度的進展，筆者認為與時代有密切的關係，尤其與衛禮賢對《易經》精神的宣揚有關，此為研究德國漢學史的學者較少留意到的地方，亦為本文觀察的重點之一。

關於本文的研究材料方面，以衛禮賢的《易經講座：永恆與變化》（*Lectures on the I Ching : Constancy and Chang*）一書為主。該書是衛氏在二十世紀二十年回到德國，在1926到1929年之間就《易經》發表的四篇演講，為衛氏翻譯的《易經》之外，最重要的《易》學著作。由於不同於翻譯的《易經》多依賴清代學者勞乃宣的說解，該書充分展現衛禮賢個人的《易》學思想，故以此為主要研究材料。

二、《永恆與變化》的成書動機與威瑪共和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原德國殖民地的青島被日軍包圍，德軍撤退，衛禮賢也離開了中國，結束長達二十二年在中國的傳教生活，這一年是1924年。返德之後，身分有所轉變，擔任法蘭克福大學漢學專業的首任客座教授，設立法蘭克福「中國學社」（Das China—Institut），主持數種漢學刊物，並且頻繁舉辦各類與中國研究和交流相關的活動，¹¹《永恆與變化》一書就是1926到1929年期間就《易經》發表的四回演講，後集結成書，1931年在耶拿以《永恆與變化：易經的智慧》為書名出版，1956年在杜塞爾多夫和科隆再版。¹²英譯本則由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埃伯（Irene Eber）所翻譯，由普林斯頓大學柏林根系列出版，書名為《易經講座：永恆與變化》。¹³1995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神話系列」

¹⁰（德）彼得·蓋伊（Peter Gay）著，劉森堯譯：《威瑪文化》（臺北縣：立緒文化，2003年），頁21。

¹¹關於衛禮賢的相關生平，參見〔德〕吳素樂（Ursula Ballin）：〈衛禮賢（1873~1930）傳略〉、蔣銳：〈衛禮賢漢學生涯的三個階段〉，二文皆收於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分見於頁30-53、98-112。張國剛：《德國的漢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5-48。

¹²Richard Wilhelm, *Wandlung und Dauer : Die Weisheit des I Ching* (Jena 1931, Dsseldorf/KLln, 1956) .

¹³Richard Wilhelm, *Lectures on the I Ching : Constancy and Chang*. Tans Irene Eber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86 ; U. K. Edition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

將該書與其子衛德明（Hellmut Wilhelm）的《易經八講》合併，出版了《理解易經：衛氏父子易經講座》，¹⁴該書常被列入美國大學研究《易經》的入門基礎書目當中。¹⁵

《永恆與變化》一書收錄的四回演講主題分別為：〈對立與協同〉（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藝術的精神〉（The spirit of Art）；〈生生之謂易〉（Constancy in Change）；〈死亡與復生〉（Death and Renewal），衛氏通過對《易經》文本的擇取發表特定主題的演講，有兩個相互關聯的主要意圖：一方面試圖向西方當代聽眾展現中國傳統文化，另一方面說明他認為《易經》當中包含的普遍智慧，藉此理解中國的思維方式。¹⁶

進一步考察四講的內容，發現其主題的設立，都有關注和針對的時代問題，分別就政治、藝術、生命和死亡等方面。換言之，衛禮賢通過對《易經》思想的闡發，主要是他對時局的看法，背景為威瑪共和時期。關於衛氏《易》學與時代的關係，《永恆與變化》一書的英譯者埃伯在該書的〈序言〉中談到：「（衛禮賢）雖然是一個多產的作家和翻譯家，但並不是一個無視於時代思想和政治潮流的退休的學者。因此，在這些講座中的詮釋，同等地表達衛禮賢所生活的世界。這些演講的意義，必須從兩個方面去探討。一來這些論述是來自一個對《易經》有深厚理解的言論，但也是一個關於時代的精神。」¹⁷

威瑪共和（1918-1933），或者更確切的說，威瑪民主共和政體，產生於1918年11月，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之際，國內因而引發一場革命推翻了帝制，同時整個政局陷入混亂，在慌亂之中由前帝國議會裡最具勢力的社會民主黨倉促宣佈成立一個代議政治模式的民主共和，這是德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同時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短命共和政體。在軍事失敗與國內革命中誕生的共和政體，實是對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省思的產物。然而，卻在開始時就充滿了動盪，過程中處處妥協和重重困難使其不堪重負。雖然在1924到1928年之間維持了短暫的穩定，但1929到1933年間每況愈下的經濟情況，來自各方對民主的攻擊最終結束了這個政體。¹⁸

根據歷史和文化學家對德國史的觀察，認為德國是一個長期存在雙重和分裂的民族。¹⁹

¹⁴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ythos Series, 1995) .

¹⁵ 趙娟：〈漢學視野中衛氏父子的《周易》譯介與研究〉，《周易研究》第4期（2004年），頁82-83。

¹⁶ Kidder Smith, "Book Reviews : Lectures on the I Ching: Constancy and Chan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p. 783-784.

¹⁷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ythos Series, 1995) , pp. 142-143.

¹⁸ （德）彼得·蓋伊（Peter Gay）著，劉森堯譯：〈（譯序）威瑪文化：西方人文精神的再現與延伸〉，《威瑪文化》（臺北：立緒文化，2003年），頁11。

¹⁹ （英）弗爾布魯克（Fulbrook）所著的《德國史：1918~2008》以「一個分裂的民族」為副標題，認為德國無論政治和內心都是分裂的，最後這個世紀自身的意識也是分裂的。詳見（英）弗爾布魯克：〈第一章 德國歷史導論〉，《德國史：1918~200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9-10。（德）

一個是黷武好戰的德國，完全卑微臣服於權威，致力於侵犯他國，同時強烈拘泥於形式；另一個是抒情詩一般的、人文主義哲學的以及嚮往世界大同的德國。²⁰而這個雙重與矛盾的特色，集中表現於威瑪時期，可說是德國史和德國民族精神的縮影，這是威瑪在德國史上的特殊意義。威瑪共和政體是在妥協的表象下，在各階級之間關係的制度性框架內部，卻隱藏著最根本和致命的裂痕，包括黨派的分裂，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之間存在著十分深刻的鴻溝；舊秩序的力量對新秩序力量的鎮壓，即舊帝國遺留下來的舊官僚體系和難以扭轉的保守退化觀念；階級分立，因為戰敗賠償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使得中下階層人民生活艱難，而上層階級卻仍保有利益，導致人們罷工和暴動不斷；社會分裂，左翼人士攻擊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平等，右翼人士則攻擊現代大眾民主制的腐敗和社會道德淪喪，形成精英文化的對立。威瑪時期的人們表現出的衝突、對立，源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國家命運的何去何從，以及一種命定覆滅的焦慮和危機感，政局的動盪不安，使得他們對完整性的渴望，德國史學家麥諾克（Meinecke）在《國家理性的觀念》一書對這種情勢有細膩的觀察：「對內在團結以及生命法則和生命事件之和諧的強烈渴望，可以說是當時德國人心中最強而力的一股力量。」²¹

在這樣時代背景下孕育的衛禮賢《易》學思想，實是對於如何調和對立與分裂的思考，充分展現了對變化中永恆的嚮往，這個想法在來自中國古老的《易經》中找到了呼應和解決之道。在〈對立與協同〉一講中，衛氏把《易經》變易的思想放在時空背景中分析，推導出「對立與協同」的《易》學基本思想，對於當時動盪的威瑪共和國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文中衛禮賢藉由數卦的討論，思考如何從對立走向團結的可能。衛氏以否、睽二卦談對立，否卦象徵國家分崩離析的情形，而造成分裂的原因，則由睽卦「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所表示，衛氏說：「民族主義，是我們今天已經達成的一個政治發展階段，不是聯合其他國家，即使是那些反對其他國家的聯盟……只會帶來進一步的對立和分裂。」²²在衛氏看來，睽卦為當今世界列強分立，利益紛爭的一種象徵。然而，衛氏深受《易經》精神的洗禮，思想相對積極樂觀，以《易》的核心思想為「變化」，所以現實只是短暫的狀態，對立只是時間的產物，同樣的當前世界的對立，也有走向和平的可能，而改變的關鍵在於「負責且能掌握情況的個體出現」²³。關於如何團結，衛禮賢以同人卦作說明。衛氏認為個體

艾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德國人》一書中從德國人觀察事物的方式，以及世代以來迄未變化的德國人內心的分裂現象出發，敘述德國人兩千年的歷史，並以「一個民族的雙重歷史」為副標題。詳見（德）艾米爾·路德維希：《德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²⁰ 同註10，頁4。

²¹ 同前註，頁142。

²²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86-187.

²³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必須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和西方優越論，而以全人類的福祉為己任，才有可能帶來永久的和平。他說：「當思想開始在人們身上體現時，解決問題的方法就將被發現。」²⁴衛氏強調精神改變世界的重要性，但是必須透過個體才能作用。個體責任在現實世界中，一是作為國家組成份子的一員，必須意識到國家榮譽與個體命運的緊密關係；另一是身為全人類的一份子，世界的命運操之在手。然而，這世界主義或人類主義，不同於以征服手段達到統一的帝國主義，衛氏區別二者的差異，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反映了威瑪時期反帝國傾共和的政治體制省思。

矛盾與分裂同樣地表現在威瑪時期的藝術形式方面。威瑪時期的藝術有兩股主要力量：一為表現主義，另一為古典主義。表現主義受外來文化影響，主要展現對傳統的決裂，作品多帶有顛覆傳統的色彩，走向自然，企圖透過藝術回歸到動物性。由於對傳統的革命精神，反對既定形式和一般觀念，愛用單純而強烈的顏色，帶有原始風味的畫風，線條分明，大肆扭曲人的臉部表情，以醜陋、不和諧，甚而歇斯底里的風格為創作的核心。深究其革命的精神，實是源於他們對現實以及一切加諸於德國身上的不確定形式感到不滿。由於表現主義對於傳統的漠視，肆無忌憚的破壞德國文化傳統，主張古典主義的作家，還以抨擊。他們認為表現主義是德國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墮落，認為以英、法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實際上是蒼老、毫無活力的。因此，主張回歸以歌德為代表的古老傳統，並將目光轉往東方，尋求挽救當時頹廢藝術界的能量。²⁵

衛禮賢〈藝術的精神〉一文就是對當時風行西方的表現主義和達達主義先鋒派思潮的反省。文中引用《易經》的數卦對藝術、音樂和生活精神三方面作討論。以賁卦思考藝術作品中內容與形式的關係，認為「道是構成藝術作品的基本要素」，藉此反對華而不實的藝術形式，將藝術活動納入理性的規範，以矯正著重「激情」的先鋒派文化，從而讓藝術回歸傳統的道路上。藉由豫卦「和諧」的音樂精神，以療癒處於分裂狀態的威瑪共和國。這個和諧是建立於人類情感的共同連結，對於宇宙秩序的順應，和一個以民族和人類利益為優先的領導者之上。然而和諧秩序的實現，唯有在和悅的音樂中交融才有可能。對於動盪時局下，國家的命運將何去何從，衛氏吸取履卦的智慧，宣揚以和悅之道面對命運，認同社會秩序下的安排，承擔個體責任，傳承文化遺產。衛氏在《易經》的傳統美學思想中，找到了藝術的永恆價值，以挽救德國傳統文化的流失，使得民族生命得以延續，生生不息。²⁶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84.

²⁴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87.

²⁵ 米尚志編譯：《動盪中的繁榮——威瑪時期德國文化》（臺北：淑馨，1993年），頁112-145。

²⁶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The Spirit of Art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Changes",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94-235.

〈生生之謂易〉一講則思考如何在困頓的環境中，迎接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藉由《易經》的智慧，衛氏體認到生命生生不息、循環變化，新的力量孕育於舊生命之中。因此，對一個社會和國家而言，不應沉浸於過去擁有的輝煌文明，守舊只會造成停滯和僵化，唯有勇於與過去決裂，才能創造一個新的時代。衛氏身處於一個因戰敗而倉促成立的共和政體，一個時代的十字路口，迷惑徬徨不知何去何從，在前面迎接的是重重的困難，懼怕使得人裹足不前。衛氏受《易經》的啟發，鼓勵人民積極面對，勇敢邁前，從時代的困境中走出。然而，拋開過去並不意味著歷史的斷層，新時代在舊時代的滋養中開花結果，如同井卦所示，取之不竭、生生不息的意象。²⁷在〈死亡與復生〉一講中，強調精神的不朽，超越生死面對永恆的生命態度，使得個體可以超脫物質世界的得失，以一種平和的心態來改變和創造這個世界。透過對《易經》的解讀，認為個體只有修煉自己的精神，將自我融入到人類主義精神中，超越肉體和自我，勇於面對死亡。²⁸

針對當時威瑪共和的情況，衛禮賢闡釋了《易經》精神，並指出其現實意義。戰後德國人民普遍表現對帝國主義的不信任、西方文明優越性的質疑，衛氏借鑑東方的智慧，提供一套異於西方知識的漢學方法，得到了廣大的呼應，興起了一股中國熱，反映了漢學在當時興起的時代特殊意義。根據德國漢學史專家張國剛先生的觀察，威瑪時期漢學進步的原因，與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失去在中國的殖民地有關，引用德國學者的解釋說：「1898年德國租借膠州灣後，德國的漢學也曾藉此獲得推動。但《凡爾賽和約》膠州灣歸還中國卻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因為它使1919年以後德國對華關係不再有西方帝國主義對待東亞民族那樣的包袱。」²⁹德國的戰敗，促使德國對中國的看法從消極、扭曲，轉而平等對待。然而，雖有觀念上的轉變，但尚未形成對漢學的重視，甚至學科的成立。過去德國對於中國經典的研究，不是傳教士在教會的利益原則下研究中國經典，就是為了經濟目的的語言學習，偏向利益取向，較少智慧方面的汲取。唯有向東方學習的精神出現，漢學才會獲得重視。

漢學在威瑪時期有卓越的發展，成為一門學科，一種研究路徑，一來是時代的需求，一來是衛禮賢的貢獻。根據德國漢學家福蘭閣（Otto Franke）的觀察，三、四十年前人們是如何抱著種族優越感來看待東亞民族，一戰後的情況完全相反，人們對東方的興趣大增，希望在那兒尋求人生的智慧。³⁰而這與衛禮賢對中國經典的大量翻譯、研究，傳播中

²⁷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Constancy in Change",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236-285.

²⁸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Death and Renewal",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286-316.

²⁹ 張國剛：《德國的漢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7-38。

³⁰ 張君勱：〈衛禮賢——世界公民〉，收於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濟

國智慧有關。吳素樂（Ursula Ballin）在〈衛禮賢傳略〉中提到：「衛禮賢堪稱威瑪共和國時期著名的中國學家。……他成功地喚起了廣大德語讀者對『中國』的興趣——不僅是對中國古典著作的興趣，而且也包括對中國 20 世紀最初一二十年紛亂歷史的興趣；尤其是在他的影響下，使 19 世紀末居統治地位的、消極的、被扭曲的中國觀轉變為積極的中國觀。」³¹衛禮賢對於德國漢學的貢獻，包括大量的經典翻譯、研究，創立研究期刊和東方學社的設立，並且在他積極的宣揚中國智慧之下，成功的扭轉德國人對中國的負面形象。

衛禮賢漢學主要是順應時代需求，反省和解決時代問題而發，在時代的困境中提供西方另一條思考的路徑，如衛氏在成立東方學社所擬訂的章程中所說的：「中國有數千年的沒有中斷的文化傳統。近幾十年，歐美人民因飽嚙戰爭之苦，認識到在強權和槍桿之外，還有另一條通向真理之路。因而紛紛注重研究東方文化。本會以研究中華文物制度為己任，研究古代經籍和歷史的關係，以洞悉國家和社會治亂之根源。」³²與當時威瑪文化的精英份子相同的是，致力於思考解決時代問題的方法，不同的是他將眼光轉向了東方，選用《易經》作為時代問題的省思，創立了以漢學為方法的思考路徑。而這個思考路徑，不僅加劇了一股理想主義對東方的癡迷，亦迎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災難後的威瑪時代精神。不光唯美主義者從威瑪共和國逃進了像通神論、神話論、東方智慧等領域，甚至著名的心理學家榮格，也深受著迷。

三、《永恆與變化》的《易》學思想與威瑪文化精神

威瑪時期的政治、社會動亂不安，經濟困難，但在文化、思想上卻是蓬勃而有生命力的。對於威瑪文化的評價，文化評論者劉森堯說：「威瑪文化是德國在 1920 年之間，威瑪共和時期的特有產物，是一種偉大人文精神的大規模展現，是二十世紀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最獨特且是最燦爛奪目的一環。」³³威瑪文化的研究者彼得·蓋伊（Peter Gay）：「威瑪共和於 1933 年壽終正寢，距今不過 35 年，³⁴卻已經成為一則傳奇。」³⁵《劍橋德國簡史》的作者瑪麗·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在文化方面，威瑪時代目睹了知識方面的

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6。

³¹（德）吳素樂：〈衛禮賢（1873~1930）傳略〉，收於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0-31。

³²同註 29，頁 41-42。

³³同註 10，頁 10。

³⁴（德）彼得·蓋伊《威瑪文化》一書寫於 1968 年。

³⁵同註 10，頁 27。

蓬勃發展和豐富的藝術創造，威瑪文化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它的時代和地域。」³⁶威瑪文化孕育於特殊的時代背景，故呈現截然不同的風貌，其所展現的文化精神也有獨特的意義。後來納粹政權掌控德國，那些被希特勒放逐所造成的德國精英移民潮，帶著威瑪精神散播到世界各地，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移入美國後，在當地開花結果。³⁷威瑪文化精神的散播，除了精英移民潮之外，還有藉由書籍的傳播方式，其中包括衛禮賢創始的《易》學派別——實用派，³⁸對於歐美《易》學有很大的影響。

威瑪政治的複雜性，使得威瑪文化所體現的時代精神有著深刻的內部分裂，也就是在對立衝突之中，表現對完滿性的渴求。內部分裂乃因對時代的焦慮和恐懼，這一方面孕育了豐富的創造力，但也造成精神耗弱，對未知領域的探索與寄託；對於命定顛覆的危機感，一方面渴望新時代的來臨，積極展現「一種指向未來的充滿創新精神的創造理念之抒發」³⁹，但又寄託於過去的美好，努力追求「西方人文精神的再現和延伸，包含對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代人文精神及啟蒙時代理性觀念的追求。」⁴⁰這是時代背景下，威瑪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藉著不同的方式對自己的社會進行分析、評論和思考所集中表現的文化精神，呈現一種共同的趨向。以漢學為思考路徑的衛禮賢，其《易》學思想與威瑪文化精神相互呼應，如埃伯在《永恆與變化》的〈序言〉所說：「1925年在法蘭克福設立東方學社之後，衛禮賢一直與馬丁·布貝爾（Martin Buber，1878-1965，哲學家）、赫塞、赫曼（Hermann Hesse，1877-1962，作家）和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精神病學家，創建了分析心理學）等著名人物保持交往，這些人都擁有廣泛的興趣。在此他們對彼此間有什麼影響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一個時期的時代精神。在同一時代的人們關心相同的事物，而他們的思想，即使是那麼的短暫，卻傾向於新的和意想不到的方向。」⁴¹

衛禮賢的《易》學孕育於威瑪共和時期之下，反映著威瑪文化精神，他藉由《易經》文本的抉擇，反省、思考時代的問題，其《易》學思想有時代性的意義。以下就衛禮賢《永恆與變化》一書中反映時代精神的《易》學思想羅列探究之：

³⁶（英）瑪麗·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著，王軍瑋、萬方譯：《劍橋德國簡史》（臺北縣：左岸文化出版，2005年），頁240。

³⁷同註10，頁27-29。

³⁸韓子奇：〈近代出土文物對歐美《易》學的影響〉，收於鄭吉雄編著《周易經傳文獻新詮》。

³⁹同註10，頁15。

⁴⁰同註10，頁17。

⁴¹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ythos Series, 1995), pp. 142.

（一）《易經》為積極的卜筮之書

關於《易經》的性質為何，在中國《易》學的討論中，主要有卜筮之書和哲理之書二種看法，究其原因，與經傳分合、孔子與《易》的關係等看法不同有關。相較於中國對於《易經》性質的解釋，西方《易》學顯得紛雜許多。根據俄國漢學家舒茨基（Shchutskii）對西方《易》學史中《易經》看法的爬梳，分為十九種說法，⁴²大致可分為：占卜書、哲學書、字典、歷史資料、宇宙起源學說和二元化系統等說法，這除了與傳教、語言學習等目的有關之外，也與他們生長的時代有關。

從十七世紀以來，《易經》已經被西方用來理解中國。但長期以來因為晦澀難解，與預測相關聯，一直被視為神秘的文本超出歐洲心靈的理解。榮格認為這樣的看法直到衛禮賢的譯本出現才有所轉變，榮格說：「衛氏致力於《易經》，欲求打開西方人瞭解《易經》卦象、圖畫、符號的門徑，乃因他受教於勞乃宣門下研習《易經》，並有多年用《易經》從事卜筮的實際經驗，對於經文的深刻理解，遠非學院派僅知中國哲理的人所能相比的。」⁴³榮格認為衛氏透過卜筮指引行動的方式，不僅對《易》有深刻的體悟，對於《易》作為積極卜筮之書意義的闡發，也有助於西方人誤解的消除。

關於《易經》的性質，衛禮賢認為是一部卜筮之書，但他反對將《易經》僅當作一部預測之書，因為《易》與一般預測之書有本質上的差異，衛氏說：「《易經》是中國上古時代的一部占卜書，與其他占卜書的區別在於：它不僅服務於揭示未來的目的，同時還指導人們在某種情況下的行動，通過這種方式告訴占問者，不要消極地將自己托付給盲目的命運，而應通過自己的行動或順應，努力或迴避來參與對未來的塑造。因而自然形成這樣的情況，即在象徵著人們不同生活境況的神秘卦象中，同時交織著對正確行動的建議。」⁴⁴換言之，一般預測之書只是消極地順從命運，《易經》的卜筮卻重視個體的積極參與，個體可以透過《易經》的卜筮把握未來趨勢，以採取正確的行動，衛氏說：「《易經》的啟示

⁴² 十九種說法為：1. 占卜書，2. 哲學書，3. 既是占卜又是哲學書，4. 中國宇宙神教的基礎，5. 諺語集成，6. 政治家筆記，7. 政治百科全書，8. 一部解釋詞語的字典，9. 中國巴克族人字典，10. 男性生殖器的宇宙起源學說，11. 中國最古老的歷史資料，12. 邏輯課本，13. 二元化系統，14. 二項式展開的祕密，15. 線之間的偶然解釋和組合，16. 街邊算命先生的花招，17. 孩子氣，18. 胡說八道，19. 漢製贗品。Julian K. Shchutskii,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80). 翻譯參考林麗玲譯、張善文校：〈歐洲研究《易經》簡史（下之二）〉，《中華易學》第17卷第9期（1996年11月），頁24。

⁴³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Foreword",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xxi-xxii.

⁴⁴ 蔣銳編譯，孫立新譯校：《東方之光——衛禮賢論中國文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頁43。

是通過各種運動，即從當前出發觀察這些運動，從運動中把握過去與未來的事物，因為在當前的運動中包含著事物的全部發展。」⁴⁵

衛禮賢以《易》為積極的卜筮之書，有助於人們察知未來趨勢，以利行動，故對於《易》的符號、卦爻辭等的解釋，都是基於如何預示未來，以及人們如何據此行動的基礎上所做的詮釋，例如：關於文王、周公與《易》的關係，衛氏認為二人賦予《易》卜筮未來的功能，他說：「周文王與周公時，才使《易經》起了大改變，將符號的卦爻賦予確定的告誡言辭，而成為可供占卜事件吉凶的依據。因個人作為與事件相關聯而影響其休咎與否，且越能體認這一點，能越早藉《易經》之助來認知事況的徵兆，……因此《易經》變成一部很奇特的卜筮之書。」⁴⁶又如對於《易》符號的詮釋，衛氏說：「《易經》本來是一個占卜的書，在回答某些問題時用『是』或『否』回答。陽爻代表『是』，陰爻代表『否』。」⁴⁷以陰陽起源於神靈，是對信徒肯定與否定的暗示。對於卦辭的解釋，也認為有預測的意義，衛氏說：「卦辭是給卦象定評，示以吉凶悔吝，使人依彖辭去決定是否停止一項無利的行動而免於凶害發生。」⁴⁸因此，關於《易》的核心意義，衛氏認為「《易經》著力解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人們怎樣才能察知未來趨勢。」⁴⁹

實際上，近現代受科學思潮的影響，講求邏輯實證、因果論，對於無法理解、驗證的事物，都會斥為神秘、無稽之談。因此，對於《易經》與占卜、預測有關聯，大多是貶斥的態度。例如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女兒海倫·伊蒂絲（Helen Edith Legge）無法理解受過良好教育的父親為何要花這麼多時間研究奇怪的文本，她對於《易經》的想法是：「即使一瞥神秘的卦，仍舊困惑其安排，對於任何人而言《易經》都是無用的，但一個學者卻企圖研究這本書。」⁵⁰她的想法反映了那個時期大多數西方人對《易》的看法。即使是理雅各，也試圖從歷史的角度，以《易》不是占卜手冊，而是周代歷史相關的集合，澄清《易經》與神秘主義的關聯。⁵¹理雅各和衛禮賢都試圖揭開《易經》的神秘面紗，介紹給西方讀者，讓《易經》能夠被接受和理解，但是二人採取的路徑卻不相同。衛禮賢並

⁴⁵ 同前註，頁 29。

⁴⁶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Introduc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liii-liv.

⁴⁷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54.

⁴⁸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Introduc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lvii-lviii.

⁴⁹ 同註 44，頁 53。

⁵⁰ Tze-Ki Hon (韓子奇), "Constancy in Change: A Comparison James Legge's and Richard Wilhelm'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 *Monumenta Serica*, 53 (2005), pp. 318.

⁵¹ Tze-Ki Hon (韓子奇), "Constancy in Change: A Comparison James Legge's and Richard Wilhelm'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 pp. 323.

不否認《易經》占筮的功能，反而積極的說明卜筮的合理性。這與二人身處的時代不同，針對的時代問題差異有關。

理雅各處於英國正要統治世界的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使理雅各相信歐洲人有一個使世界文明的任務。相反地，衛禮賢位於戰敗後的德國威瑪時期，目睹歐洲對文明的破壞力，使得二人對於《易經》的詮釋有根本上的差異。理雅各的歐洲中心主義、歐洲文明優越論，使他認為東方應向西方學習，如基督教文明和理性論，而衛禮賢則認為中國的智慧是「現代歐洲的治癒和拯救」。⁵²因此，以《易經》為神秘卜筮之書的說法，理雅各從理性的角度來看是不能接受的。反之，衛禮賢從反思、學習的角度觀看《易經》，以《易》為積極的卜筮之書，是與時代精神相呼應的。

威瑪時期對於星相學、巫術、神秘主義等特別著迷，⁵³這與處於時代之交的徬徨，故寄託於未知領域的探索有關。事實上這也是衛禮賢詮釋《易》為積極的卜筮之書，使《易》在當時會盛行的原因，根據吳素樂引赫爾曼·黑塞對衛氏翻譯《易經》的評價所說的：「除了《道德經》之外，沒有一本中國古典作品像衛禮賢翻譯《易經》那樣，迎合了威瑪共和國有教養的德語階層中國熱。衛禮賢應邀參加貴族和中產階級舉辦的沙龍……以及同樣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榮格和他的夫人，衛禮賢根據《易經》並藉助著草為這些人預卜命運。」⁵⁴換言之，威瑪時期處於時代困境的德國人，特別需要對未來洞察的能力，衛禮賢以《易》為卜筮之書的詮釋，替他們指引了一條積極的道路，衛氏對《易》的詮釋反映了時代的心聲。

（二）建立在分析心理學上的《易》學研究

西方《易》學的研究路徑中，有一個以分析心理學為方法的研究路徑，主要以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為起點。⁵⁵榮格對於《易》的理解主要來自衛禮賢的教導，榮格說：「我深蒙衛氏對我的《易經》的開導及卜筮的教示，在三十多年前我即潛心於卜筮的技術或用其方法來開發潛意識的領域，認為此方法意義非凡。」⁵⁶

⁵² Tze-Ki Hon (韓子奇), "Constancy in Change: A Comparison James Legge's and Richard Wilhelm'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 pp. 327.

⁵³ (法)里昂耐爾·理查爾著，李末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2月），頁115-116。

⁵⁴ (德)吳素樂：〈衛禮賢——傳教士、翻譯家和文化詮釋者〉，(德)馬漢茂、漢雅娜，(中)張西平、李雪濤主編：《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477。

⁵⁵ 趙娟：〈問題與視角：西方易學的三種研究路徑〉，《周易研究》第4期（2011年），頁74。

⁵⁶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Foreword",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xxii.

而衛禮賢以分析心理學論《易》的方法來自榮格的啟發。實際上二人以分析心理學論《易》，皆是針對當時西方文明理性和因果論的反省。

榮格認為現代人所以有這麼多的病痛，大抵皆是理性時代以來，西方文明側重意識的發揚，理智與意志取得全面的勝利，人格的發展遂偏向發展有關，榮格說：「西方的科學是建基於因果律原則，因果律被認為是公定的真理，但此一觀點已經起了變化。」⁵⁷因此他將眼光移向了東方，汲取東方的智慧，他說：「只有當它宣稱：科學的理解是唯一的管道時，它才可能蒙蔽我們的視野。但東方教給我們的，卻是另外的一門學問，這是更廣、更深，也是更高的一種智慧——它穿透生命。」⁵⁸榮格認為中國的智慧表現在「似乎特別注意事件的不期之偶遇，特別留意於所謂機緣的湊集，而對我們所重視的因果原則卻毫不在意。」⁵⁹他將這個稱為「共時性」（Synchronicity），「它與因果律完全相對立，因果律只是一統計的真理並非完全絕對的，只是一套事物兼相關順序的假設，而『共時性』認為時空際會所湊集之事件不僅只是巧合而已，它乃係客體事物與觀察者主體心靈間之互相契合。」⁶⁰並以《易經》中的卜筮過程說明「共時性」的合理性。因此，關於《易經》是一部什麼樣的典籍，榮格說：「（《易經》）並沒有隱含任何病態的怪人或禁慾的隱士所帶有的狂熱激情、或不可理喻的神秘預感。它奠基在高度演化的中國精神之實際洞見上。」⁶¹

同樣地，衛禮賢以分析心理學論《易》，是對當時西方文明理性和因果論的反省。關於因果論的省思，衛氏說：「從理論上說，所有的運動都被分解為各種功能，即能夠在空間上描述的外在要素。因果論的世界畢竟是靜止的，因為，假如說結果完全取決於當時的全部原因，那麼即使在不同時間裡，原則上也只存在固定不變的必然結果，而不存在生機蓬勃的歷史運動。」⁶²衛氏認為透過僵化的因果論，是無法把握瞬息萬變的世界。衛氏反省因果論，實是一戰後對歐洲擴張主義的省思，「這種因果論思想出現在歐洲絕非偶然，它是與歐洲人的精神相一致的。因果論針對的是現象，它試圖促成某種結果，所以它是與歐洲精神的積極傾向相符的。歐洲人喜歡行動和影響，喜歡促成自己打算做的事情，也喜歡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人。」⁶³因此，他將眼光望向了東方，從《易經》中看到了不同於

⁵⁷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Foreword",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 xxii.

⁵⁸ 榮格著，楊儒賓譯：〈導讀——為歐洲讀者而作〉，《黃金之花的秘密——道教內丹學引論》（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2年），頁23。

⁵⁹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Foreword",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 xxii-xxiii.

⁶⁰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Foreword",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 xxii-xxiii.

⁶¹ 榮格著，楊儒賓譯：〈導讀——為歐洲讀者而作〉，《黃金之花的秘密——道教內丹學引論》，頁23-24。

⁶² 同註44，頁221。

⁶³ 同前註，頁221。

因果論值得西方學習的思維方式，藉由卦爻辭能夠洞悉未來、把握世界，並透過心理學說明卜筮的合理性，「讓我們仍感格格不入的是藉卜筮作為瞭解事件徵兆一事，此過程雖有些神秘，但其作用簡言之事可將一個人的潛意識從不覺中引發而為行動。」⁶⁴這種潛意識的把握其實是對理智的反動，強調感性的重要，如榮格所言：「西洋今日，對理智的反動正方興未艾，取而代之的乃是感覺或直覺，在我看來，這樣的徵兆代表文化的進步，其意義乃是要擴大意識的範圍，使它超越獨斷的理智之狹隘領域。」⁶⁵衛氏藉由分析心理學論《易》，強調的其實是感性的重要，關於此，他說：「一個人越是深入地沉浸其中，不僅在自我意識中，而且在潛意識深處，那麼占卜的結果對他來說就越加清晰明白。他的無意識彷彿操縱著他的活動，以至於他能占出對自己具有重要的卦來。這是一種非理性的殘餘物，凡是在人們屈從於命運神秘莫測力量的地方，就存在這種殘餘。另一方面，恰恰通過這些關係，占卜者才能作出判斷。因為排除理智思考的目的不在於顯示占問者的前景，而僅僅是要促使潛意識流發揮作用。」⁶⁶這種反理性、重感性的思想，與其身處的時代精神是相互呼應的。

在 1918 到 1933 年之間，分析心理學觀念在德國相當盛行，尤其是 1910 年柏林的精神分析機構成立，成為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一支，到了 1920 年獨立之時。⁶⁷威瑪時期重視分析心理學，其實說明了當理智到了窮盡之處，人們越依賴非理性、神秘的事物，對於《易經》、卜筮的迷戀也是同等道理，反映了當時德國一股反理性、重感性的傾向，重視精神價值的追求。

衛禮賢以分析心理學論《易》，例如用八卦標示個體在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心理運行狀態，這是衛禮賢的創見。以八個方位對應《易經》中的八卦，每卦代表三個小時，每個時間以中間點為這一時段的高潮。從震卦到坤，代表白天的活動，震象徵個體生命在清晨的覺醒，從沉睡中的無意識過渡到清醒的意識，然後到了主觀意識投射的巽卦，開始與生命體有所連結的離卦，最後到強調事物之間關係確立後的協同；兌到艮卦，代表夜晚的休息，兌表示愉悅地卸下白天的壓力，抖落心靈的灰塵，乾代表內心的反思，然後在無意識之中進入了夢鄉的坎，最後是象徵凌晨的艮，是一天的過去，也是新的一天的開始，形成了一個生命的循環。⁶⁸又如用分析心理學詮釋否、睽、同人等卦，說明如何使對立轉為協同的

⁶⁴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Introduc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liv.

⁶⁵ 榮格著，楊儒賓譯：〈導讀——為歐洲讀者而作〉，《黃金之花的秘密——道教內丹學引論》，頁 27。

⁶⁶ 同註 44，頁 57。

⁶⁷ 同註 10，頁 57。

⁶⁸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63-174.

可能。⁶⁹從八卦符號、卜筮過程，到對於個別卦的詮釋，衛禮賢大量運用分析心理學的方式討論，可謂其論《易》的基礎和獨特之處，對於後來以心理學論《易》的研究路徑有很大的影響，包括精神價值的追求、因果律和形式邏輯的限度、現實和理想之間的關係、自然的智慧、中國的心靈等問題。⁷⁰

（三）對立與協同的有機《易》學思想

「易道」廣大，所能涵括、體現的文化精神其實十分廣闊，然而衛禮賢的《易》學思想卻特別著重「對立和諧」精神的發揮，可謂衛氏《易》學的基本思想。

二十世紀初的德國飽受戰爭摧殘，政治分裂、階級對立使得個體強烈地感受到內心的撕裂，所以表現對「完整性」的渴求，著名作家霍夫曼斯塔（Hofmannsthal）於 1927 年在慕尼黑大學的演講，最能充分表達當時德國人內心深刻的嚮往：「在 1920 年代的德國，所尋求的並不是自由，而是結合，他們已經深刻了解到，沒有對生命之完整性的共同信仰，要好好活下去是不可能的。唯有透過結合，生活才會順利。零散瑣碎的個人必須匯集成為國家的核心，所有由心靈所主導的生命要素，必須由心靈去適度加以掌握，然後匯集成為一個精神的結合體。」⁷¹這股對「完整性」的渴求充分反映在威瑪時期的藝術家、歷史學家、小說家等作品之中，例如：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著名小說《魔山》，是針對當代歷史而寫的，主要捕捉光明和黑暗的辯證式掙扎，呈現這兩者的激烈鬥爭，但同時卻又將這二者串連在一起，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⁷²德國史學家麥諾克（Meinecke）在《國家理性的觀念》中描繪國家的理想——一種有機結合，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一起結合去面對現實；⁷³重要的建築家孟德爾松（Erich Mendelsohn）對於建築的思考，認為一棟成功的建築物，「如同任何有機體、生物及藝術作品中的二元性，也都是『高舉的』一般。」也就是所有二元性往上升、互相對稱以及持續。⁷⁴對於完整性的渴求，使得某些字眼在當時被大量的運用——人民（Volk）、領袖（Führer）、有機體（Organismus）、帝國（Reich）、統治（Entscheidung）、社群（Gemeinschaft），顯露的不過是一種組織團體和完整性的需求。⁷⁵

⁶⁹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76-193.

⁷⁰ 趙娟：〈問題與視角：西方易學的三種研究路徑〉，《周易研究》第 4 期（2011 年），頁 75。

⁷¹ 同註 10，頁 146-147。

⁷² 同註 10，頁 160。

⁷³ 同註 10，頁 162。

⁷⁴ 同註 10，頁 165。

⁷⁵ 同註 10，頁 163。

他們從不同的領域出發，然而所關注的卻是一個共同、根本性的問題——如何從對立走向和諧。

為求解決之道，威瑪時代的精英份子多回歸自身文化傳統中尋求，包含對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代人文精神及啟蒙時代理性觀念的追求。⁷⁶相對於這些精英份子尋根式的作法，衛禮賢將眼光轉向了東方，認為西方文化的不足需要東方智慧補足，東、西文化表面對立實為互補，深受中國古老《易經》影響的思想較當時的思想家更為樂觀積極。

衛禮賢在《易經》的思想上建立了一套有機的《易》學觀，主要是如何使對立走向協同的思考。首先，對《易經》所蘊含的對立辯證思想作討論。關於陰陽，衛氏認為這兩個原則並不是二元論所理解的對立之物，而是對應之物，一旦從純粹的可能性（漢語稱之為「無極」）中產生出現實性（漢語稱之為「太極」），二者就會成為一個統一體。⁷⁷換言之，衛氏認為中國蘊含的二元思想實際上不同於西方以絕對存在為原則的對立，而具有一種反轉變化的積極可能性。而這個對立的消除，必須通過內心的直覺，衛氏從心理學的角度說明如何從對立到協同。他認為對立是認識事物的先決條件，但是當無意識中的對立蠢動化為清晰的意識，訴諸於言語，衝突於是產生。⁷⁸衛氏以否、睽二卦說明之。否卦代表無意識中的對立，天在上，地在下，沒有交集，使得生命停滯，一切在對立中運作和對抗彼此。當否卦進一步變化，上卦中爻降到下卦中爻的位置，下卦陰爻和上卦陽爻交換，得到了睽卦。睽卦上火下澤，互卦則為下火上澤，反映了內部的對立；就卦德而言，上卦為離，附麗，象徵清晰的意識，下卦艮，象徵言語，因此表示對立得到了清晰的意識，將以明確的語言表達。⁷⁹衛氏認為當個體專注於意識，就產生了區別性，只有提升精神的作用，才能消除對立。在《易經》的六爻中，精神屬於上位，人（靈魂）屬於三、四爻的中位，物質世界位居初二爻的下位。靈魂是連接精神和物質的橋樑，當精神作用於個體靈魂，並化為個體行動作用於物質世界，從而改變世界。也因為人是精神和物質的橋樑，所以衛氏特別強調個體的責任。個體必須接受宇宙規律的安排，在道的規律下走向協同。⁸⁰

依據道的自然規律下安排的協同，是建立在以對應、互補的陰陽二極為基礎的有機體之上。衛禮賢認為《易經》的全部精髓在它主張的那種有機變化，他認為這種有機變化的

⁷⁶ 同註 10，頁 17。

⁷⁷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57-158.

⁷⁸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63-170.

⁷⁹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76-185.

⁸⁰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85-193.

自然觀與歐洲機械的自然觀之間存在著本質區別：歐洲自然科學只承認按因果聯繫的機械法則匯集起來的運動物體，物質的最小單位是某種可以想像為原子的東西，一切事物最終都是通過原子的機械運動而匯成的；而中國首先孕育一種關於世界萬物的有機動力學觀念，認為萬物的最終表現是萌芽，即自內而外有機發展變化的細胞。陰陽二極是宇宙萬物發展變化的基本力量，二者的關係是對立統一的，當每一極發展到頂點時，就會向自己的反面轉化。⁸¹關於這個《易經》所揭示的宇宙進化規律，衛氏認為同樣適用於人生和社會。衛氏首先要人對於生命都是建立在對立的基礎上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只有予以肯定，才能適應外部世界，以保持內在自我與外在世界之間的和諧。這種認識對於全面觀察生活具有重大的價值，它導致了超越日夜、生滅的觀念，教導人們要以永恆的觀念來看待一切，並由此來把握其必要性。這種觀察事物的方式如果得到正確培養，就能保證內心的巨大安寧。⁸²

衛禮賢以《易經》的「對立和諧」精神為基礎展開的有機《易》學思想，是針對當代問題的反省，並提出解決的方法。衛氏認為西方文明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這種思想建立於因果律的基礎上，因為沒有包容、變動性，是造成對立的主因。衛氏認為《易經》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對立力量的最終統一，而統一只有在萬物的內在本性中才是永恆而穩固的。因此，他藉著翻譯、研究的方式，將這股來自東方的永恆力量介紹給西方的讀者，提供在時代巨變下分裂的心靈，一條通往內心安寧的道路。

四、結論

對於衛禮賢的《易》學思想，有些人認為有過於讚譽中國智慧的現象，例如衛禮賢《孔子與儒家》（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一書英譯本的譯者 George H. Danton 和 Annina Danton 在序中提醒他們的英語讀者，要留意衛禮賢在對中國智慧、政治、美學和社會等方面的支持，是一個極端少見的例子。⁸³事實上，衛禮賢的《易》學思想孕育於一戰後的歐洲，對於中國智慧的崇敬，乃是將中國文化視為解救西方文明沒落的良藥，因為他在《易經》中看到對生命的樂觀積極，值得歐洲人學習。因此，筆者認為對於西方《易》學的認

⁸¹ 同註 10，頁 45。

⁸²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p. 185-193.

⁸³ Richard Wilhelm,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George H. Danton and Annina Periam Danton (New York 1931), p.iii.

識，不應以中國為標準評價其優劣，必須考慮所孕育的西方學術和時代背景。

衛禮賢《永恆與變化》一書的《易》學思想主要有三：

第一，以《易經》為積極的卜筮之書。不僅可以揭示未來，還指導人們在某種情況下的行動，不同於歐洲長久以來將《易》視為神祕不可理解的預測之書，而是透過占卜，個體可以透過作為，積極地掌握自身的命運。同時，他認為《易經》成為卜筮之書，與文王和周公作卦爻辭有關，並以陰、陽爻為占筮的回答，陽爻代表「是」，陰爻代表「否」，而卦辭藉由吉凶悔吝等詞語，作為人行動與否的依歸。

第二，建立在分析心理學上的《易》學研究。大量運用意識、潛意識等分析心理學的詞彙解釋《易經》，包括以「共時性」說明卜筮的合理性；從無意識、意識到精神詮釋否、睽、同人等三卦，說明如何從對立到協同；以靈魂與精神的和諧詮釋賁卦，說明創造的過程。還有，用個體一天的心理運行狀態詮釋八卦，這是衛禮賢的《易》學創見。衛氏以分析心理學論《易》引發的問題意識，包括精神價值的追求、因果律和形式邏輯的限度、現實和理想之間的關係、自然的智慧、中國的心靈等問題，對於後來以心理學方法論《易》的，有很大的影響。

第三，對立與協同的有機《易》學思想。衛禮賢認為這是《易經》的全部精髓，其《易》學思想也是建立在此基礎上。衛氏以陰陽二極是宇宙萬物變化的基本力量，二者的關係是對立統一的，在此之上孕育了一種關於世界萬物的有機動力學觀念，認為萬物的最終表現是萌芽，即自內而外有機發展變化的細胞。將此有機體思想運用於生活上，有助於內在自我與外在世界間的和諧，使人得到內心的平靜。

衛禮賢的《易》學思想特色，具有現實意義，主要是針對時代問題而發。威瑪共和國是德國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在戰敗後衝突、對立的陣痛中誕生。這個時代背景下體現的文化精神，有著深刻的內部分裂，以及對完滿性的渴求。對於時代的焦慮和恐懼，一方面孕育了豐富的創造力，但也造成精神衰弱，對於未知領域的好奇與寄託。衛氏的《易》學思想就是孕育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故以《易》為卜筮之書，能為人指引未來的道路，以分析心理學詮釋《易經》的特殊方法論，以及從對立到協同的思考，和建立有機體思想以滿足對完滿性的渴望。

衛禮賢在威瑪時期以《易經》的東方智慧反省西方文明的弊病，呼應了戰後德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不信任、西方文明優越性的質疑，得到了廣大的迴響，興起了一股中國熱，促成漢學學科的成立，對於德國漢學的推動有極大的貢獻。其《易》學思想進而與西方的精神文化內在地糾纏在一起，成為推動西方精神與文化演進的一個環節。

徵引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米尚志編譯：《動盪中的繁榮——威瑪時期德國文化》（臺北：淑馨，1993年）。
- （德）艾米爾·路德維希：《德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 （英）弗爾布魯克：《德國史：1918~200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法）里昂耐爾·理查爾著，李末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2月）。
- *（德）彼得·蓋伊（Peter Gay）著，劉森堯譯：《威瑪文化》（臺北：立緒文化，2003年）。
- （德）馬漢茂、漢雅娜，〔中〕張西平、李雪濤主編：《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11月）。
- *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衡禮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張國剛：《德國的漢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張善文：《象數與義理》（臺北：洪葉文化，1997年）。
- 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
- 廖名春等著：《周易研究史》（湖南：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
- （英）瑪麗·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著，王軍瑋、萬方譯：《劍橋德國簡史》（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5年）。
- *榮格著，楊儒賓譯：〈導讀——為歐洲讀者而作〉，《黃金之花的秘密——道教內丹學引論》（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2年）。
- 劉瀚平：〈易學在西方〉，《國文學誌》第2期（1998年6月）。
- *趙娟：〈問題與視角：西方易學的三種研究路徑〉，《周易研究》第4期（2011年）。
- 韓子奇：〈近年出土文物對歐美《易》學的影響〉，收於鄭吉雄編著《周易經傳文獻新詮》（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二、外文部分

- David R. Knechtges, "The Perils and Pleasures of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收於鄭吉雄、張寶三合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 * Iulian K. Shchutskii,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80). 翻譯參考林麗玲譯、張善文校：〈歐洲研究《易經》簡史（下之二）〉，《中華易學》第17卷第9期，（1996年11月）。

- * **Kidder Smith**, “Book Reviews:Lectures on the I Ching: Constancy and Chan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ythos Series, 1995) .
- * **Tze-Ki Hon** (韓子奇) , “Constancy in Change:A Comparison James Legge’s and Richard Wilhelm’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 *Monumenta Serica*, 53 (2005) .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un, Li-xin, Jiang Rui.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Zhang, Guo-gang. *Sinology in Germany*. (Beijing: Zhonghua Press, 1994).
- Jung, C. G.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by Yang, Ru-bin.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Taipei: Shangding Culture Press, 2002).
- Peter Gay.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by Liu, Sen-Yao. *Weimar Culture*. (Taipei: Li-Xu culture Press, 2003).
- Zhao, Juan. "Question and Perspective: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Studies of Chinese in West", *Studies of Zhouyi*, 4 (2011), pp.71-77.
- Iulian K. Shchutskii.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London : Routledge & K. Paul, 1980).
- Kidder Smith. "Book Reviews:Lectures on the I Ching: Constancy and Chan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http://dx.doi.org/10.2307/2055701>
-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 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ythos Series, 1995).
- Hon, Tze-Ki. "Constancy in Change: A Comparison James Legge's and Richard Wilhelm'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 *Monumenta Serica*, 53, 2005.

The Philosophy of the I Ching, Weimar Culture and Its Spirits in Richard Wilhelm's *Constancy and Change*

Cai, Yu-xun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13; Accepted March 6, 2014)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on the view that the I Ching study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re based on different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refore, the I Ching study in the West is not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e East, nor can it be judged under the eastern standards and criteria. The I Ching study in the West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correctly based on the western academic tradi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essay focuses primarily on Richard Wilhelm's *Constancy and Change* to illustrate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Wilhelm's study of the I Ching, and thus demonstrates the western I Ching stud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own historical era.

Wilhelm's philosophy of the I Ching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First, I Ching is taken as an active book of divination. Second, the study of the I Ching is based up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Third, the oppos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organic philosophy of the I Ching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s. Wilhelm's philosophy of the I Ching is realistic and practical, evolving through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that the era faces. Wilhelm was situated in the post-war Weimar Republic, and the cultural spirit at that time had a profound internal division and a strong desire for wholeness. The anxiety and fear at that era not only sparked off rich creativity in man, but also resulted in man's psychasthenia and their inclination for the unknown. Wilhelm's philosophy of the I Ching is incubated at such period, hence I Ching is

taken as a book of divination, which can direct and assist man into the future. Also, with analytical psychology as a special methodology to interpret the I Ching, with the consideration from opposition to collabo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rganic philosophy, Wilhelm aims to fulfill the historical desire for wholeness.

Keywords: Richard Wilhelm, *Constancy and Change*, the study of the I Ching in the West, Weimar culture and its spirits